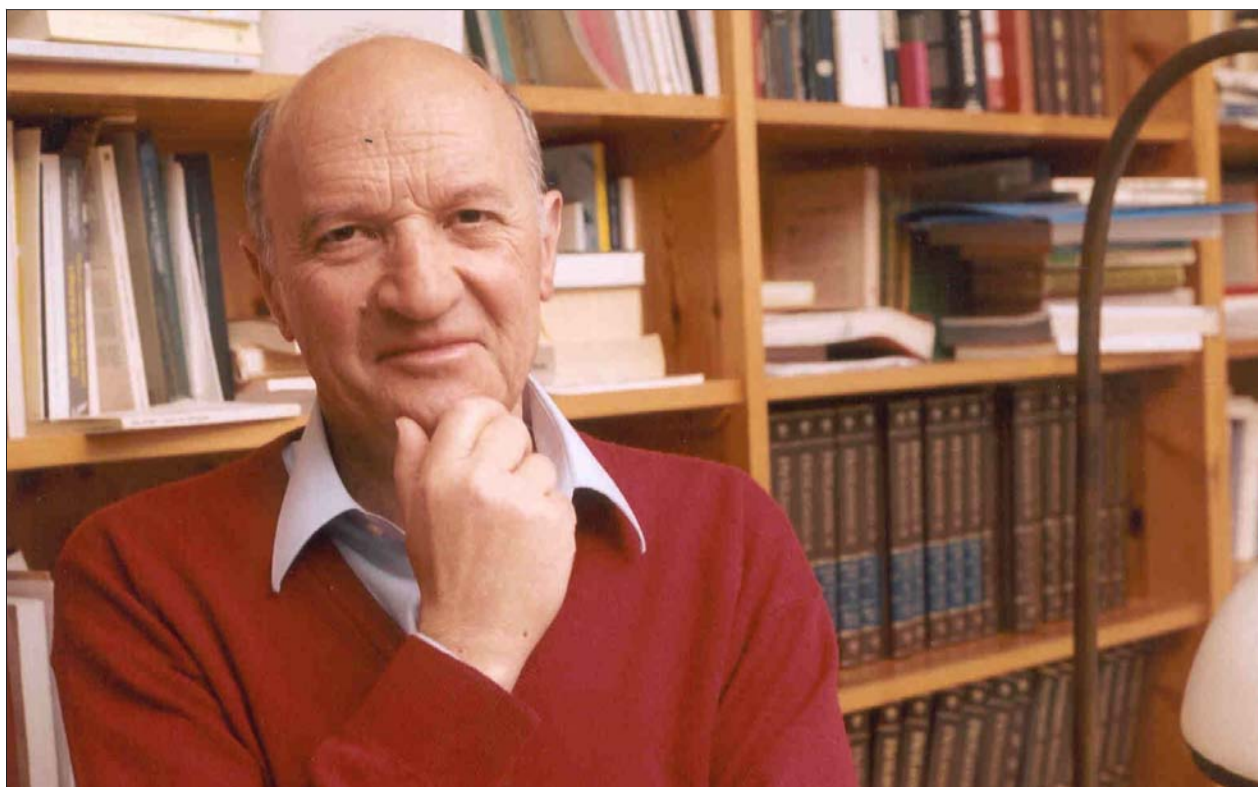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不是“畸形学”的历史过程

——多梅尼克·洛苏尔多访谈录

□本报特约记者 田时纲

编者按:多梅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 1941—)是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哲学史教授、国际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国际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思想学会主席。2008年,他曾发起西方进步学者声援北京主办奥运会签名活动。2011年11月24日,是洛苏尔多教授70寿辰。此前,本报特约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田时纲对洛苏尔多教授进行了采访。



多梅尼克·洛苏尔多

田时纲:首先,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感谢您邀请我参加为庆祝您70寿辰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11月,我在贵校从事短期研究时,您送了我一本《俄国革命和今日中国革命脱离历史吗?》。您为什么想写这样一部书?

洛苏尔多:该书初版是在1999年,当时,冷战结束被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甚至是“历史的终结”。在西方,左派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共产党人声明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但立即补充说,他们和苏联历史,甚至和中国历史(他们竟然说那里“资本主义复辟了”)没有丝毫的关系。为了反击这种“脱离历史”的思潮,我以尊重历史的态度,阐明从俄国十月革命到邓小平改革后中国崛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史。

田时纲:您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

洛苏尔多:1947年,美国外交官凯南(Georgio F. Kennan)形成“遏制”政策理论时,强调必须“加剧紧张状态,让苏联政治承受”,从而“促使那些倾向最终找到出路,或让苏联政权崩溃,或让它变暖”。

除了美国的“遏制”政策外,苏联内部严重衰弱导致其解体。我们应当反思

列宁的英明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党拥有夺取政权的理论,然而从本质上讲,布尔什维克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缺少革命的理论,苏联共产党的严重错误在于未作任何实际努力填补这一空白。

田时纲:您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意义是什么?

洛苏尔多:在20世纪初,中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推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反殖民主义浪潮。然而,由德、日法西斯分别发动的侵苏和侵华战争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殖民战争。因此,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国的长征及抗日战争是名垂史册的伟大阶级斗争,粉碎了最野蛮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让伟大民族沦为所谓“优越”种族贵族的奴隶的罪恶野心。

不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并未随着获得政治独立而终结。早

在1949年,毛泽东就鲜明地预见到,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必须从军事阶段向经济阶段过渡。

今天,面对美国依然妄图维持技术垄断,旨在继续行使霸权,甚至实行新殖民主义间接统治,有必要着力强调:中国革命不仅是结束一百多年来受奴役状态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长期斗争,不仅是进行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而且也是粉碎帝国主义技术垄断的斗争。要知道,西方对技术的垄断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几百年统治和压迫的结果!

田时纲:2005年问世的《自由主义的反历史》一书获得极大成功,在意大利一年内再版三次,并被译成多种语言。请您谈谈为什么用这个书名?

洛苏尔多:我的著作并非拒绝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自由主义的反历史》采用的方法论是:研究对象不是抽象的自由思想,而是自由主义,即具体的自由运动和自由社会。这本书主要批驳自

由主义和“自由西方”的自我颂扬和辩护观。在这种思想传统内,大肆赞颂自由,却闭口不谈对劳动阶级尤其对殖民地的奴役与伤害。

应该说,源于1688—1689年光荣革命时自由英国的最初国际政策,就是保障对贩运黑奴的垄断。无独有偶,更加典型的是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美国建国后最初36位总统中,竟有32个奴隶主。不仅如此,在几十年内,美国竭力推销奴隶制,其卖力程度不亚于今天推销“民主”。在19世纪中叶,美国先通过战争吞并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再重新引入奴隶制。尽管先是英国,随后是美国感到取消奴隶制的必要性,但黑奴被中国和印度的苦力代替,深受变相奴隶制的奴役。1952年12月,美国司法部长致函最高法院,主要讨论公立学校合并问题,言词“雄辩”地说:“种族歧视为共产党宣传提供了炮弹,在友好国家中也引起我们对民主信仰忠诚度的怀疑。”美国历史学家C. Vann Woodward对此评论道:华盛顿的

“隔离有色种族”政策,不仅在东方和第三世界遇到危险,而且在美国心脏地区也不得人心。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当今,美国乐此不疲地指责中国缺少民主,但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一个本质要素是取消种族歧视,在美国取得这一民主成果,要感谢全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中国是这一运动的重要部分。

田时纲:据我所知,在《共产党宣言》众多意大利译本中,有3个最为著名:1902年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译本,1943年陶里亚蒂译本,1999年洛苏尔多译本。这部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问世的杰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意义?

洛苏尔多:我在《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导言中,努力回顾这一杰作发表后150年的历史。1840年,19世纪欧洲另一伟大人物托克维尔发表第二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在核心一章的标题中,他断言“大规模的革命变得越来越少”。然而,考察1840年后100年或15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位法国自由派人士的论断不能成立,在世界历史上,这一时期革命爆发颇为频繁。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制度的起义。不仅如此,《共产党宣言》高瞻远瞩地描述了今天被称为全球化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其特征是生产过剩的巨大危机,会导致巨大社会财富的破坏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贫困化。

《共产党宣言》号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前预告了在第三世界实现的革命胜利,譬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共产党宣言》预见以新经济为特征的全球化,虽然主要就欧美而言,但同样为希望独立发展经济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指明了历史方向。

田时纲:作为意大利左派学者,您认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什么?

洛苏尔多:第一,葛兰西强调“领导权”对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重要性。

早在1926年他写道:“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领导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而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在现代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尤其重要。

第二,葛兰西充分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的复杂性。起初,会出现“集体主义的贫困、痛苦”。接着,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方面,考察葛兰西对苏联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立场受益匪浅。当时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在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某些分子和阶层”,工农群众继续过着艰难的生活,而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身着皮大衣,享尽人间幸福;“历史把这种前所未闻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恰恰在于这种矛盾”。但这不应成为腐化堕落和疑惑动摇的原因。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能为了阶级的普遍与长远利益而牺牲那些直接利益的话,也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共产党必须积极努力改变这种现象,尽快缩小工农群众和其他阶层的收入差异。葛兰西的这段论述有益于西方左派理解今日中国的现实,对中国同志也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葛兰西对共产主义社会有精辟见解。当我们讨论废除国家和在市民社会中被重新吸纳的神话时,葛兰西让我们注意市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形态。他还指出国际主义并不否定民族的独特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后,这些民族独特性继续存在。正如说到市场,葛兰西强调“确定的市场”,而不是抽象的市场。葛兰西的这些真知灼见,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弥赛亚主义,正是这种思潮阻碍建设后资本主义社会。

第四,即使《狱中札记》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也拒绝把近代史和资产阶级革命妖魔化,视为某种“畸形学”的历史。同样,我们共产党人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要善于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失误,但绝不能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这些篇章妖魔化、视为某种“畸形学”的历史。

田时纲:谢谢!期待您再次来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今日意义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文 金寿铁/译

诸位,我从下述几个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今日意义。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马克思主义指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一点十分重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以及后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提供了可以理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框架。根据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经济危机并非起因于愚蠢的政客、贪婪的资本家、愚蠢的政策。换言之,尽管到处充斥着愚蠢的政客、贪婪的资本家,但并非因为他们而产生经济危机。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创造性地发展了“有机危机”(organic crisis)概念,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有机危机”不同于日常危机,其显著特征是来势猛、范围广、破坏性强、周期较长,通常持续三年至四年。“有机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根本矛盾,表明了资本主义框架内很难解决的危机。这种危机根深蒂固,影响长远。这正是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的看不见尽头的危机。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把今日经济危机称作第三次大萧条。他把今日危机与19世纪末大萧条乃至更严重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提并论。反观葛兰西的“有机危机”思想,今天则更具深刻的现实意义。

政治理论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

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这一点,有人不会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经济还原论,认为“作为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十分有益,但对于政治毫无赐教”。这是极端错误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政治理论居于核心地位。正因如此,马克思深入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重要问题。基础意味着作为根基的经济,上层建筑意味着反映经济基础的政治、法律等。忽略或无视上层建筑,这是极其错误的见解。

正如马克思所言,上层建筑是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场所,它使一个阶级正视自身的阶级意识并进行斗争。虽然经济危机起因于经济基础及其阶级冲突,但其矛盾导向何处取决于上层建筑的斗争。正因如此,葛兰西予以另一种新的解释:经济危机触发旨在解决这一矛盾的斗争,然而解决方案并不确定。

在本质上,如今资产阶级力图解决问题的进攻方式就是为了稳定体制,前所未有地投入新自由主义猛药,这是疯狂之举。因为从一开始对危机爆发表示赞同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是,这一进攻正在遭遇坚决的抵抗,反对紧缩的欧洲工人、大学生斗争以及阿拉伯革命正是这种抵抗。

阶级斗争与新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决定当今社会的关键因素是劳动与资本的阶级斗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对工资劳动的剥削恰恰是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但是,这种敌对状态并非总是鲜明

的,通常阶级斗争被隐蔽或转移开来。有时候,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冲突的倒是资本家。归根结底,所谓新资本主义也是资本家明确地从阶级意识视角所追求的阶级斗争。新资本主义是资本家阶级的阴谋规划,旨在通过提高剥削率来增加利润。

有趣的是,相当多的激进左翼成员比资本家们更明确地捕捉到了阶级斗争,甚至这些人认为,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正在消失。根据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观点,工人阶级已经终结,大众这一力量已作为历史的主体出现。对此,我的第一个论点是,他们所谓劳动形态的大部分并无新意。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就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工资劳动是形成剥削必不可少的条件,在19世纪英国稳定的工资劳动与大量失业、不稳定劳动共生并存。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资本主义不乏回归19世纪资本主义的某些侧面。19世纪,劳工运动的成就之一就是组织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人从事稳定的劳动。有时,我所批判的劳动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冲突”。奈格里把组织得好的有组织工人称作“库拉克”(Kulak),库拉克指的是俄国的富农。这种说法很可笑。事实恰恰相反,就业不稳、低工资的工人越多,高工资的有组织工人就越容易受到攻击,资本家们善于理解这一点。当谈论劳动市场的灵活化时,他们声称要把所有的工人都变成不稳定的工人。改善全体工人的劳动条件,争

取所有工人的稳定的就业条件和高工资,同样有利于高工资、有组织的工人。应该明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什么工资工人如此重要?正是由于被剥削者为资本家的利润作贡献,资本家才需要依赖于被剥削的工人。因此,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工人获得了自身的力量。这样,当诸位听到所谓工人阶级业已终结的话时,就不能不哑然失笑。其实,有组织的工人和非组织的工人之间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这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正式部门的工人与非正式部门的劳动之间存在对立利害关系的说教。

革命理论与实践

革命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社会主义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建立,谁也代替不了这一事业,但这并不是说革命是一种自动行为。革命不是从空中创造有的过程,大众与组织是一个辩证的互动过程,就革命而言,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也需要有意识的组织化。革命往往作为非正式部门的首次斗争而发生,然而,资本主义随后加以反击,此时,为了制服反击而需要组织。资本主义以意识形态方式、物理方式等一切方式妨碍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出现。工人阶级想要获胜就应该实行中央集中化。惟其如此,才能进行有效的对抗,因此,需要政治组织化。

卢卡奇认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组织发挥一种中介作用。他的意思是说,理论没有实践就是盲目的,再好的理论若得不到实践的检验就是无用的。同样,没有理论的实践也

是盲目的。仅仅作出尝试而不从理论上分析成功与否,那么就无法推翻旧制度。政治组织把理论与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政治组织将理论加以正式化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上。通过将理论应用于现实,我们观察其对现实的适应程度,并作出相应的修正。

这样,在革命组织中,民主讨论和辩论显得极其重要。为了将理论正式化,评估理论对现实的适应程度,民主便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一旦人们加入一个组织,就认为再也不能作为个人而生活,那么,组织化的革命必然会丧失个人的个性吗?恰恰相反,隶属于某一集团,并不是压制个性,而是加强个人的能力。如果有人以为作为个人可与资本主义单打独斗,那么他只需在家里整天看电视、上互联网,直至萎靡不振、身心疲惫。

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世界上,危机与革命正在复活。诸位提出的问题是在,在这风云变幻的历史之中,应当处于何处,仅仅守望世界疯狂旋转的样子,还是参与旨在变革世界的、有组织的斗争?如果选择后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就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原载:알렉스 캘리니코스: 마르크스주의 오늘의 의미—앞시금 2011 페락 강연, <http://durl.me/cyuyz> 10:27:32 PM Jul 24th, 2011)

(译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者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 1950—),英国约克大学政治系教授,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理论家之一,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杂志的编辑。主要著作有《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1986)、《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91)、《马克思主义与新帝国主义》(1994)、《帝国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2009)、《幻想的篝火:自由世界的双重危机》(2010)等。本文系作者在“马克思主义2011:变革还是野蛮?”(韩国首尔,2011年7月24日)研讨会上的所作闭幕演讲。